

第一章

为了宣扬唯物主义

说起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教科书之类的书籍中，往往引用列宁的话，将之定义为“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和历史领域的运用和扩张”。在那里，有着将世界分为“自然”界和“历史”界两个半球的近代哲学式的构图，并可以看出被称为“唯物辩证法”的“第一哲学”似乎先行于与上述两个半球相对应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大部门这样一个构图。——这样的模式，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既成的诸体系相为伍，作为以教科书的形式进行叙述的一种工具，也许比较方便。但是，这样做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图产生误解。〔1〕在

〔1〕《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版刚一发行，在东德哲学界，赛德尔（《人与现实的实用和理论的关系——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一章新版而作》，收于《德国哲学杂志》1966年第10期）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关于赛德尔的这篇论文，有拙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新版在东德哲学界所引起的波纹》（《日本读卖新闻》1967年2月27日拙文集《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至诚堂，1968年刊再录），关于赛德尔论文的论争的日文资料有芝田进午编《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争》（青木书店，1970年刊）。另外，在对赛德尔进行批判的同时，对他的主张表示了一定理解的科辛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第2版1967年，日文版有藤野涉、秋间实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月书店），与斯大林时代被固定化的苏联教科书内容是不一样的。不过，遗憾的是，东德的新教科书不久便成了“禁书”之后，又回到了苏联型，更确切地说，又回到了“苏联教程的翻译版”的固定化时代。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照拙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概念——东德哲学界的动态》（《东风》1974年5月号）。

“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和历史领域的运用和扩张”被说起时，甚至可以认为，那并不是在表明首先确立唯物辩证法，然后再将它运用、扩张，这样一个理论形成的经过，只不过是显示体系构造的配置而已。然而，事实上“运用、扩张”往往被理解为是与理论形成史的经过相照应的。这样的事情，将历史唯物主义喜剧性地进行了歪曲。——值得庆幸的是，在日本的马克思研究者当中，战前的三木清等先哲暂且不论，战后不久出现的田中吉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上的先行论一直成为定论，很少有人将“适应、扩张”的意义从字面上去理解。但是，在我们看来，即使是出于体系构图的需要，也必须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不是将“第一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加以“适应、扩张”的产物，并以这样的问题作为通道，来宣扬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执笔的遗稿，被称为是告知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的誊写稿，〔1〕是这样明确指出的：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

〔1〕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稿中的基本底稿、改订稿、誊写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问题点》（1965年春，收录于前引《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等一系列拙稿中屡屡有所论及。请在下注所引版本中详细地看一看手稿的实际状况以及内在关联。

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

请留意在这里所看到的‘历史’概念的广泛性。那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视为‘两个侧面’的单一的、统一的‘历史’。而且,这里所说到的‘自然史’;不是宇宙进化论,以及地球进化这样层面的自然界的史,而是被当成“自然史”——“所谓自然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没有按照将自然界与人类(自然界与历史)截然分开的近代哲学方式去理解存在。〔2〕

不得不说,说起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把握)时的‘历史’;正如这里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将它视为包括具有特别意义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历史’的话,以及如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materialistische Auffassung der Geschichte)是我们说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时的单一的、统一的‘历史的系统知识’的话,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与自然界并列的,与历史界这样的半球相关联的通常的历史观,而是整体性的世界观。

读者当中,也许有人对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只言片语’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另外,我们自身也担负着规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系统关联的责任。但是在这里,我们将对有可能出现的疑问的解答放到本文当

〔1〕 原文第23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20页。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凡核对过的中译文,都将标明其出处。)另外,这个段落在手稿中全部被划掉了(因此,以前的版本中都没有印出来)。之所以被划掉,不是因为文字内容不当,估计是因为认为不适合作为——“章”的开头。在此,对划掉的理由不予深究,仅仅想指出一点,即该段落的内容与手稿的其他部分岂止是不相矛盾,而且是相吻合的。

〔2〕 关于这个论点,请参考拙稿:《被历史化的自然和被自然化的历史》(收录于哲学会编《关于自然》有斐阁,1974年)。另外,虽然与笔者的意见不同,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日文版有元浜清海译《马克思的自然观》法政大学出版局)也值得重视。

中,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构图本身,这个问题作为预备性的注意事项,对其要点假定性地进行论述。

另外,在本稿中,笔者打算提出的几个新的论点,也许与笔者这十余年来的历次发言有些重复,但对于笔者来说,本稿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地平所进行的专题论述。看在这一点的份上,即使看上去像是将已经发表的拙稿压缩摘编而成的章句随处可见,也恳请读者谅解。

第一节 古典哲学的辩证扬弃

恩格斯在通称为《费尔巴哈论》的晚年论稿《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在回顾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时期曾这样写道:

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相互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1〕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前)东德社民党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迪茨出版社,第21卷,273页。以下将此全集略记为“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314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对处于德国古典哲学顶点的黑格尔哲学的内在扬弃。

即使从我们第三者的眼里看来,这种自负也有充分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装点近代哲学尾声的黑格尔哲学时,超越了近代哲学的地平。在这里,与所开拓的新世界观的地平相照应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

今天,人们在论述对近代(作为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的、世界观的地平的超越问题时,将对所谓‘主观-客观’模式〔1〕的克服当作标志的做法已成了常识。我们也可以像以往一样,把这一点作为辨别的标志。

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站在‘主观-客观’模式的哲学的顶点。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费希特以及谢林哲学中,就已经是这样。黑格尔哲学,纵然处在‘主观-客观’的圈子里,但是,它有着克服‘主观-客观’的二元性对立的志向。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超越“主观-客观”的模式,与他们充分汲取了黑格尔的教训有很大的关系。

黑格尔在他的可以说是首篇论文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中,很早就做过如下阐述。顺便提一下,同样的思想在《论哲学批判的本质》〔2〕以及《耶拿实在哲学 I》〔3〕等文稿中也可以见到。显然,这是黑格尔的基本立场。

〔1〕 对这个特性,拙著《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存在构造》(劲草书房,1972年刊)第一章曾经论述过。

〔2〕 黑格尔:《关于哲学批评的本质及其与当前哲学状况的关系》,《黑格尔全集》20卷本,苏尔康普出版社,第2卷,第171页,特别是184页。

〔3〕 莱茵-威斯法伦科学院编《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90页。另外,在这个新全集版中,没有使用‘耶那实在哲学’这样的称呼,在此,依照通称。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身躯、信仰与悟性、自由与必然等等这样形式的对立……转变为绝对的主观性与绝对的客观性这样的对立形式。扬弃被固定的这样的对立,正是理性唯一感兴趣的事。〔1〕

独断的唯心主义,本来就否认客观事物,将作为对立规定一方项目的主观按自己的方式来规定,并作为绝对事物来定义……但是,那是独断论(若用纯粹的形式来说的话,便是唯物主义)否认主观的事物。——如果,否认对立性规定的一方,由绝对抽象化所导致的同一性,只管追求这样同一性的欲求被置于哲学思索根底的话,不论是否认主观还是否认客观,其价值都是相等的。两者的对立规定在意识当中,两者的实在性也基于意识之上。不论是(唯心主义的)纯粹意识也好,还是独断论者的事物自身也好,仅仅其本身还不能充当意识。纯粹的主观事物,作为抽象事物,与纯粹的客观事物是相同的。独断论的唯心主义将主观事物作为客观事物的实在根据而定义,独断论的实在论将客观事物作为主观事物的实在根据而定义。〔2〕

黑格尔基于这样的理解,在克服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性,进而言之,在消解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独断的唯心主义”与“独断的实在论”对立的情况下,形成了视绝对精神为实体-精神

〔1〕 黑格尔:《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21页。

〔2〕 同上书 第61页以后。

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虽然在第三者来看仍然是唯心主义,然而,黑格尔自己却认为它扬弃了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性‘唯心主义与实在论的对立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至少在他们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继承了力图超越主观性与客观性、精神与物质的两极对立性,以及个别与普遍、存在与本质、形状与质料、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等的对立性,甚至唯心主义与实在论的对立性这类黑格尔的主题。之后,他们洞察到了黑格尔无法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从而得以站在新的角度来谋求解决办法。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开拓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应的新世界观的地平,是因为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式的主题。特别是,其过程不是单线型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曲折,也出现了飞跃。

本稿虽然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立过程进行专题性追踪,然而,作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和构图进行为我化的一种方法,在留意黑格尔哲学是如何被扬弃的同时,也想分析一下其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二

马克思在他 26 岁的时候,与比他年轻 2 岁的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神圣家族》(1844 年执笔)当中,像是解释前面所引用过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回想的前半一样地写道: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

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1〕}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两人十分彻底地把黑格尔的体系应用于神学。前者以斯宾诺莎主义为出发点，后者以费希特主义为出发点……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2〕}

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3〕}

在 1844 年秋天，正是马克思高度赞赏费尔巴哈的时候，^{〔4〕}

〔1〕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47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 版，第 177 页。

〔2〕 同上书，第 147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77 页。

〔3〕 同上书，第 99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77 页。

〔4〕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学。”（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 1 部分，第 568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 版，第 157～158 页）。在 1844 年 8 月 11 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在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概念，那是什么呢？”（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26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 版，第 450 页）。在《神圣家族》中，也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如下赞美：“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而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98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8 页）。

他立志于在费尔巴哈的延长线上扬弃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断定,被视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自然和精神的二元性的统一的黑格尔式“绝对精神”,只不过是“人”〔1〕进行形而上学的改造而已,因而采取了费尔巴哈式的“人”的立场。这是因为,自然与精神的真正的统一,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而只能是“人”。当时的马克思认为,只有以主观性与客观性、精神与物质的现实的统一体“现实的人”为原理,黑格尔式的独断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对立的扬弃主题,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马克思虽然称赞费尔巴哈,但是并没有标榜费尔巴哈的所谓的“唯物主义”的立场〔2〕,而是牵强地将费尔巴哈的“唯灵论与唯物主义对立的克服”加以理解,并试图采取那样的立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作为黑格尔的弟子,在当初采取的是唯心主义的立场自不待言〔3〕,他们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并没有马上接受唯物主义的立场,从1843年到1844年,一直在摸索“扬弃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对立的见地”。

〔1〕尤其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较早时期对人的社会性作了比费尔巴哈更具体的考虑。他在刊载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较早地写到“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8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452页)。

〔2〕不过,因为费尔巴哈自身曾经说过:“唯物论虽然是人们所知的建筑物的基础,但并不是建筑物本身”,“对唯物论者,我只能消极地,而不能积极地赞成”,所以,我认为对这点不能过于强调。

〔3〕关于他们极端到什么程度,请参照拙著:《青年马克思论》(平凡社,1971年刊)以及《恩格斯论》(盛田书店,1968年刊)的相关部分

同样是在 1844 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之前所撰写〔1〕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扬弃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立场,提倡了“人本主义-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标榜了“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2〕的立场,乃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里不详细加以引证。恩格斯在 1844 年所发表的一连的杂志论文中论述道:

唯物王义……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观性的斗争把 18 世纪的哲学引向对立的两极;客观和主观对立,自然和精神对立,唯物主义和唯灵论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和抽象单一对立……18 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少的事。〔3〕

〔1〕 围绕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执笔期间以及巴黎时代的 5 册《经济学笔记》的前后关系等等,拉宾的观点一度成为定论(见拉宾《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三个收入来源的比较分析》,《德国哲学杂志》1969 年第 2 期),而在近年有人提出了异议。对于其间的情形,服部文男等人曾经进行过评介。服部文男:《〈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见》,东北大学《经济学》第 40 卷第 2 号,1978 年;服部文男:《〈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新阶段》,《现代与思想》1979 年 12 月号 陶伯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难题与疑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17~35 页)。另外,作为最近的研究,有《思想》1983 年第 8 号上中山隆次译《所谓〈1844 年经济学哲学草稿〉问题——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集会报告》。

〔2〕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 1 部分,第 577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7 页。

〔3〕 这里连续 3 次引用的出典是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00 页,第 511 页,第 553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57~658 页。

这表明了他力图克服‘唯心主义对实在论’的矛盾对立的意向。

马克思、恩格斯此后采取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不再言及唯灵论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对实在论的对立性的扬弃。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自己曾经非难过其片面性的“唯物主义”。即使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没有什么不同,但这里的唯物主义不是单纯朴素的“唯物主义”,而是包含了力图扬弃和统一唯心主义对实在论、唯灵论对唯物主义的过去的主题。在那里,他们维持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精神与自然·的真正统一这样的主题(此意本身,也可以说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是这种形式的东西)。

哪怕是为了了解这一时期的状况,也让我们来看一看定位于被视为“绝对精神的真实形态”的“人”在 1844 年的构思吧。

三

撰写《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神圣家族》时候的马克思,虽然在以费尔巴哈为楷模的同时也试图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内在的扬弃,但并没有局限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框架中,而是显示了其固有的思想。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许多后年思想的萌芽。不过,作为现在的首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置于称为‘人’这样的‘真实形态’,并试图以此来规定自然与精神的现实统一的马克思的构思。

众所周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绝对精神视为实体-主体,〔1〕视为这个实体-主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的

〔1〕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前言(《黑格尔全集》第 3 卷,第 22 页)中众所周知之处外,根据其《关于弗利德里希·海因利希·雅考比斯著作》(苏尔康普出版社)中的某处(第 4 卷,第 432 页)甚至在所谓《耶拿哲学 I》(前引《黑格尔全集》第 6 卷,第 315 页)也可以看出其含义和构图

总过程来观察世界，提示了壮大的体系结构。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在第三手稿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专题论述部分，显示了将黑格尔的构思脱胎换骨地、批判地继承的姿态。〔1〕

当时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实体—主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的构思本身是“被发现的”“历史运动的表现”而给予了积极的评价。〔2〕但是，也认为将‘实体—主体’视为‘绝对精神’是黑格尔的致命问题。

作为辩证法……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首先必须是一个结果，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黑格尔的情况下），就是神，绝对精神。〔3〕

因此，黑格尔陷入了“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4〕的状态中。

当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是被形而上学地改造过的“人”，黑格尔的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是在人的“劳动”中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的过程，其“历史的过程”是被形而上学地改造，被思辨地反射出

〔1〕 作为对此间状况的专题探讨，请参照拙著：《青年马克思论》（平凡社，1971 年刊）的第 8 章。另外，该书的第 6、7、8 章是探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部分，本书的后半部将主要探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 顺带说一下，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甚至写道：“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 1 部分，第 574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3 页。

〔3〕 同上书，第 584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75～176 页。

〔4〕 同上书，第 584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76 页。

来的。

上述的说法是图解法式的论断,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局限,不管怎样,我们毕竟看到“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而且,马克思按照那样的路线,表明了继承发展黑格尔哲学的立场。

马克思认为,只有与在“人”的劳动中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的历史过程相结合,才能真正完成黑格尔所希冀的自然和精神的统一。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3〕

人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人的社会的生成行为中演化的自然,是人的现实性自然;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4〕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

〔1〕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1部分,第574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2〕 同上书,第574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3〕 同上书,第546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4〕 同上书,第543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正象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但历史是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2〕

——“历史”只能是“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的过程，“人”得以自然而然地、为我地出现的过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可以称得上是“劳动本体论”的主张，而是进行了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学性的具象性议论。如果按与后论的关系来引用的话，马克思还进行以下的立论：

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通过工业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

但是，如果结合构图来说的话，当时的马克思将统一自然与精神、客体性与主体性的辩证法的历史总过程作为实体—主体，采取了将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真实态”的“人”摆在中心的构思。限于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人”不单单是存在的诸个人，而是被视为作为费尔巴哈所谓的“类本质、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人”（der Mensch）。实际上，那既不单单是本质，也不单单是存在，它不超出黑格尔学派中的实体—主

〔1〕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1部分，第544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2〕 同上书，第579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

〔3〕 同上书，第543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体,主体-实体的‘共同理解’的范围,而且在自然而然的、为我的形态上,它是作为本质与存在、类与个的如实的统一态来被理解的。顺便提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甚至这样写道:

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循环运动。〔1〕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无情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它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2〕

就这样,马克思在 1844 年形成了“扬弃统一”的构思。这个构成不是定位于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而是定位于称为‘人’的实体-主体,而且是人的劳动这一现实的历史过程。

但是,“主观客观(主体-客体)”图式究竟有没有因为这样的构思而被克服呢?主体-客体的对立性的统一被设定为要解决的课题。但是,只要黑格尔式的‘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的构图、实体-主体的客观化和再主体化的构图被维持着,不得不说它仍然还没有超出‘主体-客体’图式的圈子。

而实际上,马克思在次年及时地自我扬弃了在 1844 年的暂定构思。他在保持将眼光定位于人的劳动的历史过程上等

〔1〕 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第 1 部分,第 545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30 页。

〔2〕 同上书,第 539 页。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23 页。

观点、方法的同时,得以超越黑格尔学派式的实体-主体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的构思,也可以说超越了“主观-客观”图式。与此同时,马克思逾越近代哲学一般的地平,开拓了新世界观的地平。而其地平正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

第二节 人本主义的超越与新地平

马克思在扬弃 1844 年时的暂定构思,开拓新的地平的时候,不仅是因为自发的成熟,还因为遇到了外部的冲击。这个外部机遇,便是恰巧发生在当时黑格尔左派内部的激烈的“内部派性”争论〔1〕,特别是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整个黑格尔左派所提出的震撼性的内部批判。

在这里,追踪黑格尔左派内部的论争,详细分析“施蒂纳危机”〔2〕不是本节的目的之所在。不过,我们可以在对“论争”简要地加以叙述的基础上,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穿越论争的漩涡一事,来分析他们是如何克服黑格尔左派的水准,特别是“人本”主义的水准的,以及在那样的基础上,开拓了什么样的新境地。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 1844 年初的《德法年鉴》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1〕 关于这些情况,请参照拙稿连载《〈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背景——从文献学研究到对内容探求的桥梁》(《知性的考古学》创刊号,1975 年 3 月,社会思想社刊)。这一系列论文,将收录于由良知力先生与笔者共同编辑、监译的《黑格尔左派论丛第一卷》御茶之水书房,预定于 1984 年出版。

〔2〕 那个问题也强烈地冲击到费尔巴哈以及 B. 鲍威尔,就连他们也不得不“修正轨道”;对此,请参照笔者在与城塚登、清水多吉的谈话《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核心》(《理想》1977 年 9 月号)中的发言。另外,论及这个问题的论稿有国分幸的《黑格尔学派中人际关系的始末》(《名古屋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会年报》1981 年度版),作为本稿的补充,希望能一并阅读。

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之外,还在 1845 年初发表了共著《神圣家族》,然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1〕在黑格尔左派的相互论战中即使有时被言及,也不过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当作费尔巴哈的变种,根本上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2〕今天,在我们的眼里看来,即使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问题上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性,不过,只要他们被视为停留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作为类存在的人)’主义的大框架内,被当作变种看待也的确是无可奈何的。——对于费尔巴哈变种的“人本”主义这样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如果将他们的立场改成“人本”主义立场的话,事情也许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思想上的成长,已经不允许他们满足于“人本”主义。他们需要在对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的共鸣进行自我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再加以超越。尽管如此,但那并不是单纯地屈服于论战者。他们在超越“人本”主义的同时,也超越了论战者的水准。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从整体上克服了黑格尔左派意识形态赖以成立的范例,从而站到了新地平上。

—

施蒂纳在其大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只有一次,而且

- 〔1〕关于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认定,请参照马克思《马克思传》(杉原四郎、重田晃一、松冈保、细见英共译,密涅瓦书房)第 131 页。考奴的观点,请参照奥古斯特·考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 2 卷,1962 年,第 349 页。另外,根据良知力的介绍,海因岑(他是在《莱茵报》继马克思之后的主编)在《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伯尔尼,1848 年,第 60 页)中甚至写道:《神圣家族》的退还数超过了发行数,也就是说,就连笔者所赠送的也被退回来了(《马克思解说》现代理论社,第 2 卷,第 200 页)。
- 〔2〕关于 B. 鲍威尔本人的反应,请参照前引拙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背景——从文献学研究到对内容探求的桥梁》中的介绍。另外,关于《神圣家族》的书评,在《知性的考古学》第 3 号(社会思想社刊)中作了介绍。